

2010敦煌论坛: 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国际研讨会综述

■ 沙武田

[摘要]: 2010年7月21~24日在莫高窟举办了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2010敦煌论坛: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分为十个专题:洞窟藏文题记以及吐蕃密教文献与洞窟思想研究、政治与样式、历史与艺术、石窟经变画、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毗沙门天王像、莫高窟第465窟研究、图像专题研究、吐蕃文物文献研究。本文发表了与会专家学者报告的最新内容和观点,总结并评述了本次会议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 2010敦煌论坛;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

2010年7月21至24日,由敦煌研究院主办、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和科研处承办的“2010敦煌论坛: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国际研讨会”在莫高窟举办。来自日本、法国、瑞士、新加坡、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3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5篇。

7月21日上午会议开幕,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研究员致开幕词。她代表敦煌研究院热烈欢迎各位代表的到来,强调了吐蕃在对敦煌近70年的统治中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迹及其意义,希望本次会议成为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新起点。在随后四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分别就洞窟藏文题记以及吐

蕃密教文献与洞窟思想研究、政治与样式、历史与艺术、石窟经变画、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毗沙门天王像、莫高窟第465窟研究、图像专题研究、吐蕃文物文献研究等专题作了深入讨论,涉及相关学科领域中一系列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采用专场专题的形式报告。现将会议论文按专题综述如下:

一、洞窟藏文题记、密教文献、密教义理思想与禅法研究

著名敦煌藏文专家、法国国家科学院今枝由郎教授的《莫高窟与榆林窟的“T”形题记框》发现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现存数条“T”形题记框,重点阐述了榆林窟第25窟的题记问题,进而讨论了该类题记对洞窟营建断代的意义。关于该窟,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其壁画风格与年代。本文则从该窟壁画的“T”形题记框入手,并与莫高窟的同类题记框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此类题记框可作为洞窟断代的可靠依据。该文进而精确地推断出其所在壁面的年代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786—848年,由此推断出榆林25窟的开凿始于821/822年唐蕃和盟签订后不久。但三面壁画的绘制仍有年代先后的差异:东壁壁画可能是吐蕃时期最先以藏式风格绘制的;其余

诸壁的壁画则可能创作于848年汉人收复该地之后。后者尽管遵从了最初的规划和设计,但完全以汉地风格绘制而成。

著名密教美术史专家、日本东方研究会田中公明教授的《〈旁塘目录〉与敦煌密教》介绍了西藏博物馆藏古代吐蕃王国的写本经录《旁塘目录》(dKar chag 'phaṣ thaṣ ma),认为它是已知常用的吐蕃经录《邓噶目录》的重要补充。

《旁塘目录》中收有《邓噶目录》中未收录的密教经典及其注疏,即西藏撰述的密教文献,揭示出吐蕃时期在西藏传播的密教的实际形态。令人称奇的是,在田中先生的《敦煌密教及美术》一书中言及的出于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几个文本,在现行《西藏大藏经》中未见收录,却见于《旁塘目录》。因此《旁塘目录》的新发现对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明当时密教与《旁塘目录》之间关系密切。该文还介绍了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并列举出目录所收的一些重要文献,如《金刚毗迦罗成就法》(dpaḷ rdo rje hūḡ gi sgrub thabs)(KP.911)的仪轨,《降三世轨》(KP.887)及其注疏(KP.888),Pelliot No.292中《初会金刚顶经》的“金刚界品”,《伴有眷属毗卢遮那赞》(rNam par snaṣ mdzad 'khor daṣ bcas pa la bstod pa)的藏文赞,赤松德赞

御制佛典“圣毗卢遮那和释迦八大菩萨赞”(‘Phags pa rnam par snaṣ mdzad daṣ/ Śā kya thub pa daṣ/ byaṣ chub sems dpa’ brgyad la bstod pa)(KP.670),“圣婆伽梵毗卢遮那佛及眷属八大菩萨各自的赞及其真言”(‘Phags pa saṣ rgyas bcom ldan ‘das rnam par snaṣ mdzad ‘khor sems dpa’ brgyad daṣ bcas pa la so sor bstod pa daṣ gzuṣ sṣags daṣ bcas pa)(KP.419)等。田中先生推断《旁塘目录》成立的年代顺序是:《旁塘目录》→《邓噶目录》→《旁塘目录》增补部分。

台湾圆光佛学研究所佛教图像研究中心郭祐孟副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密教“心月轮观”的学理与实践:以敦煌石窟为例》。该文以“心月轮观”的内涵运用为主题,以《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为义理基础,以敦煌石窟密教图像中表现月轮的形式与变化为材料,进行文献与图像的参照与对话,讨论了唐代这一禅法是否具体落实的轨迹。

三位学者从全新的角度考察敦煌吐蕃文化的重点问题,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二、政治与样式

中央美术学院罗世平教授发表了《谁主沉浮——莫高窟吐蕃时期维摩诘的图式及其语境转换》一文。罗教授利用敦煌石窟中维摩诘经变的资料,重点讨论了维摩变“贞观样”在中唐时期的变体,并认为这种图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隐喻了社会对政治势力态度的表达,实属图像受政治左右的代表事例。

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莎教授的《敦煌中晚唐时期吐蕃系绘画样

式考述》讨论了中晚唐时期敦煌遗存中的吐蕃系艺术品,并认为通过其样式嬗变的线索,可发现印度——尼泊尔的密教绘画范本对中唐的敦煌壁画与绢画都产生过影响。该文并省思了吐蕃样式在归义军时代出现的原因。

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邱忠鸣博士报告了《中国征服佛教?——蕃据时期敦煌石窟中的画屏》一文。该文以艺术史、人类学等方法,以蕃据敦煌时期石窟壁画中的屏风画为中心,探讨了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传统绘画研究的意义;并指出汉族士人在外族统治的特殊背景下反而主动选择汉族传统文化与艺术形式,折射出他们的复杂心态。这一特定现象对于我们思考不同历史时期的同类现象具有重要启示。

故宫博物院王中旭博士作了《生天:吐蕃时期敦煌〈弥勒、天请问变〉的流行与对应——吐蕃时期敦煌经变对应问题研究之一》的报告。壁画中经变对应的问题是解读洞窟壁画配置及思想的一把钥匙。该文认为吐蕃、归义军时期《弥勒变》与《天请问变》的对应主要是兜率天、忉利天的对应,表达了升天思想;该时期敦煌生天思想的流行与唯识学的传播有关。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生魏健鹏的《关于敦煌壁画中吐蕃赞普像的几个问题》讨论了敦煌壁画中吐蕃赞普像的来源、服饰礼仪、吐蕃统治者与地方大族及民众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而对中唐壁画中这一新元素进行解读。

本专题论文主要结合吐蕃占领敦煌这一特定的历史与政治背

景,研究这一时期敦煌壁画样式上的变化,及其表现出来的思想与文化内涵,提出诸多新观点。

三、历史与艺术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研究员的《小议敦煌壁画中的蕃装人物》认为敦煌壁画中的蕃装人物形像,除《赞普听法图》中的吐蕃君臣之外,其余如供养人和各类生活场景中的人物均非吐蕃人,所示社会风情亦非蕃俗;各类蕃装人物壁画反映了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各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

敦煌研究院文献所研究员沙武田博士报告的题目是《莫高窟吐蕃时期洞窟第359窟供养人画像研究——兼谈粟特九姓胡人对吐蕃统治敦煌的态度》。他根据新发现的莫高窟第359窟供养人题记,考证出此窟为吐蕃时期粟特人石姓家族营建的功德窟;并结合历史背景,就供养人像所反映的服饰新现象,洞窟功德主、粟特胡人对吐蕃统治的态度等问题作了探讨,最后回答了这一洞窟中吐蕃装供养人大量出现的原因。

敦煌研究院文献所赵晓星博士报告了《莫高窟第361窟的中唐供养人——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三》。赵博士实地考察了莫高窟第361、386、14三个洞窟,以莫高窟第361窟的中唐供养人为讨论的中心,认为第361窟供养人不同于以往按供养人身份高低整齐排列的方式,而是以践行传供法会的形式出现;并进一步讨论了新出现的“振铃”供养方式,提出壁画中高缠头供养人可能来自于吐蕃本土,而第361窟的营建可能有吐蕃人的参与。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

士生郭萍的《吐蕃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修筑者中的粟特人》梳理了吐蕃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中反映出的粟特工匠或窟主材料,并阐述了以下问题:1、尽管吐蕃占领河西之后,唐前期移民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从化乡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不少包括工匠在内的粟特人留守,继续参与石窟营建工作;2、随着统治制度的变迁,粟特工匠的身份地位随之变化,这也反映在石窟壁画中;3、粟特美术在吐蕃时期的敦煌随着社会变迁发生改变,对当地美术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趋势仍是交融。

本场报告集中讨论了蕃装人物、吐蕃与粟特关系等问题,公布了敦煌吐蕃时期壁画在题记与图像方面的最新发现,并探讨了在方法论上的“图像陷阱”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四、石窟经变画研究

日本佛教大学副教授大西磨希子博士报告了《吐蕃支配期敦煌西方净土变研究——以十六观图为中心》,系统整理了吐蕃时期敦煌壁画观无量寿经变画中的十六观图像,并与前后时代的同类图像进行比较,对其中所反映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于向东博士的《莫高窟第154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研究》以该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为中心,根据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结合SP83、P3998画稿题记与敦煌壁画同类图像题记,首先对第154窟的经变细节进行详细考释,接着分析其结构安排特点,最后探讨与该窟经变设计者身份相关的一些问题,指出一些画稿可能从中原流入。但经与

SP.83、P.3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比较,发现第154窟经变画的设计者可能参照了已有画稿,并注入不少个人思想。

早稻田大学讲师下野玲子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吐蕃时期敦煌法华经变小考——以莫高窟第159窟为中心》。她对吐蕃时期新出现的法华经变下方的屏风画内容进行考察,并谈及该窟位于西壁龕外南侧的普贤变及其下方屏风画内容之间关系,指出该屏风画并非传统上认为的“普贤事迹画”或“峨嵋山图”,而应是表现与《法华经》内容相关的情节。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刘颖的《敦煌莫高窟吐蕃时期的金刚经变研究》认为吐蕃时期敦煌盛行《金刚经》信仰。壁画金刚经变中出现的新样胁侍菩萨源自吐蕃本土,和榆林25窟正壁菩萨、带藏文题记的绢画菩萨有相同特征,和吐蕃后期密教菩萨经变画中的新样式也有关联。其经变画注重表现经文中带情节性的文字,无论从写经题记还是经变的故事画,都体现出当时世俗信仰中忽视义学,重视抄写经文、图绘经变等供奉行为的特征。

本场重点探讨了石窟中的经变画在中唐的新变化,发现诸多新的图像与表现形式,同时涉及到敦煌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吐蕃本土图像交流等重要问题。

五、密教尊像研究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永增研究员的《瓜州榆林窟第三窟恶趣清净曼荼罗及相关问题》在田中公明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对榆林窟第三窟壁画“恶趣清净曼荼罗”进行了详细解读,补充

释读个别图像内容,认为这种曼荼罗在西夏时期应当十分流行。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陈清香教授的《敦煌吐蕃时代的文殊菩萨图像研究》为探讨文殊师利菩萨图像,举出此时期中显密两教各两种不同题材为例。显教题材包括问疾维摩的文殊和与普贤对应的文殊。密教题材中如八大菩萨中的文殊与千臂千钵文殊,二者为此时期的新题材。她还以同时期莫高窟、榆林窟和原藏莫高窟17窟的绢画为例,说明不同洞窟布局、不同经变题材下所创作的不同文殊风貌,并对证原经典文义,探讨其宗教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研究员的《敦煌中唐不空绢索与如意轮观音研究》梳理了敦煌吐蕃时期洞窟与绢纸画中的不空绢索与如意轮观音图像,交待其经典依据,探讨布局特色,重点讨论图像艺术中的唐风与蕃风关系。相关题材图像的配置、胁侍构成,甚至曼荼罗坛城,都不能直接依据经典仪轨而得,显示出宗教艺术创造性的一面。莫高窟等处吐蕃时期壁画一派唐风,但却隐藏着一丝蕃迹。反之,绢画中的曼荼罗却是一片蕃风。不空绢索与如意轮均昭示出持明密教的重要内涵,相关经典的内涵即陀罗尼与手印,也有简单初法的坛法,充分体现出典型的持明密教的特征。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讲师滨田瑞美博士的《莫高窟吐蕃时期的千手千眼观音变——以眷属图像表现为中心》整理了中唐时期敦煌现存的千手千眼观音变图像,认为这一时期的敦煌地区没有传播其他地区盛行的《千手经》系统的千手观音,而是流行带有金刚界曼荼

罗系统眷属的千手千眼观音变。

台湾“佛教图像学”研究中心赖文英研究员的《榆林25窟药师佛及其相关问题——兼论正壁的卢舍那佛与八菩萨》从药师佛的角度切入,探讨了榆林25窟药师佛与同壁其他图像之间的关联,进而论述了药师佛在这一洞窟整体内涵上的意义,以及此类图像的艺术流变与图像发展。

日本兵库县立博物馆学艺员桥村爱子女士发表了《敦煌孔雀明王——从晚唐到北宋期的密教图像和经典依据》。该文梳理了敦煌晚唐至北宋时期的敦煌孔雀明王的图像资料,并指明其经典依据。

密教题材的造像在敦煌吐蕃时期洞窟中的占有重要位置,彰显出独特的图像发展轨迹与思想内涵。可是与显教图像的研究相比,它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本次会议对吐蕃时期洞窟密教图像的集中研究,必将推动该领域的研究。

六、西藏考古与艺术

陕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研究员的《西藏芒康、察雅吐蕃石刻遗存考古调查》首次公布了藏地发现的吐蕃时期的佛教造像,并讨论了其艺术风格。2009年6月至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芒康、察雅两县已知的五处吐蕃石刻遗存做了全面调查,并新发现两处吐蕃石刻遗存:芒康县查果西摩崖造像、朗巴朗增拉康造像、然堆村马龙沟线刻造像、达琼村摩崖造像,察雅县相康石刻造像、仕达摩崖造像等,题材以大日如来为主。该报告对敦煌吐蕃时期造像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张长虹博士的《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的卫藏和西夏风格——以桑达石窟和帕尔嘎尔布石窟为例》(论文参会)以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较为关注的桑达石窟和帕尔嘎尔布石窟为例,讨论了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的卫藏和西夏风格,指出敦煌可能是联系卫藏和西藏西部艺术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中转站。

首都师范大学谢继胜教授、博士生贾维维的《温姜多无例吉祥兴善寺修建史实考述——兼论藏文史书温姜多寺、昌珠寺与于阗工匠入藏的关系》一文尽可能复原寺院最初的建筑样式及其后的演变过程。他们检出不同时期的藏文文献中有关温姜多宫的修建和于阗艺术家入藏的史实的记载,指出温姜多宫与敦煌的联系,梳理了温姜多由“宫”转“寺”的过程。赤热巴巾所建寺院毁于灭佛时期,而11世纪重建的温姜多寺则采用了晚唐至辽金汉地九层密檐木塔的建筑样式,实际上是西藏唯一的一例汉式密檐木塔。论文从昌珠寺建寺传说和寺内供奉塑像的配置及其与于阗的联系,进一步探讨了温姜多寺于阗僧人入藏的事迹,11世纪前后吐蕃寺院的造像配置,以及文献记载的史实与客观史实的年代错位等问题。

瑞士西藏艺术史专家赫尔穆迪·纽曼和海蒂·纽曼(Helmut F. Neumann and Heidi A. Neumann)共同报告了《藏西皮央、东嘎石窟窟顶绘画》(Defining the Sacred Space Painted Ceilings in Dungkar and Tsaparang in Western Tibet)。他们对敦煌洞窟中的窟顶壁画装饰艺术与西藏西部皮央、东

嘎等地洞窟窟顶艺术进行了比较,并说明了二者之间的艺术联系。

西藏考古与艺术和敦煌之间关系密切,互为补证,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七、毗沙门天王像研究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翎博士的《图像辨识习作之一——以榆林25窟前室毗沙门天图像阶段性认识为中心》试图辨识榆林25窟以及类似的毗沙门天王组合图像中各种形象的名称,发现中心主尊是兜跋毗沙门天,左侧是大辨才天女,右侧是独健。而五代开运印画则代表了这种以毗沙门天王为主尊的图像组合的最终形式:中心主尊兜跋毗沙门天,其左侧上为举小儿的鬼子母,下为着虎皮的独健,其右侧为大辨才天(被替换了的吉祥天)。这种组合可能属于每日修法所用的毗沙门曼陀罗相。

新疆文物古迹保护研究中心彭杰副研究员的《敦煌兜跋毗沙门天王像刍议》简要回顾了敦煌兜跋毗沙门天王像的研究史,对图像组合中地神的图像学意义、天王所穿长身铠甲的外来影响以及文献中所谓的“于阗样式”天王像等三个问题作了再次讨论。

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岛幸代博士的《九世纪吐蕃毗沙门天信仰的诸问题——以甘肃、四川造像的比较为中心》讨论了敦煌和四川两地毗沙门天王像的一些共性和个性,重点探讨了四川地区常见的弥勒主尊两侧毗沙门天王像的组合形式及其思想意义。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佐藤有希子女士报告的题目是《中唐吐蕃时期毗沙门天像考察》。她一一检索了盛唐、中唐和晚唐时期敦煌洞

窟中的毗沙门天王像,提出了于阗样式与吐蕃新样的概念,并就造像的组合关系进行了辨证。

四位专家不约而同对毗沙门天王像集中讨论,对推动特定造像题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八、莫高窟第465窟研究

台湾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黄英杰教授发表的题目是《从藏传佛教看莫高窟第465窟艺术》。他认为在宗教绘画特别是藏传佛教密宗艺术中,在观修对象的需求下,宗教实践和宗教传统、文本之间的关联性很强,而艺术创作的空间则相对较小。该文因此试图以旧译宁玛派与新译的噶举、萨迦派及相关教法传承做为探讨切入点,从藏传佛教密宗的上师、本尊、空行与护法等角度,结合各种教法传承的历史、经典文献与图像,从新的角度对465窟的部分壁画提出新看法,认为壁画当为西夏时期所绘。

台湾华梵大学林怡蕙的《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图像结构之分析》主要就第465窟的图像逐一进行分析,探讨图像之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而讨论洞窟的修习观念与思想所在。她发现莫高窟第465窟主要观修的对象是密教金刚部无上瑜伽的本尊,而无上瑜伽修行法门宣称一世成佛是可能的,即不必轮回,是一种临终与轮回再生的瑜伽。无论是慈悲,还是修行的方法和艺术,其重点皆在开发佛身,正如开发佛心。她通过经文的整理与字词意的分析,带出密教慈悲与智慧的最高修习法门,阐发了密教图像的识别作用与修行之关联性。该文提供了对无上瑜伽本尊的基本认识,并进而探讨了修行者明心见

性至究竟的证悟成佛之义理。

敦煌研究院文献所勘措吉馆员的《莫高窟第465窟藏文题记释读》重新释读了该窟中的一组藏文题记。这一新的释读指出该题记并非纪年,而是与洞窟营建某年之月份有关。

莫高窟第465窟一直以来是敦煌石窟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本次会议以该洞窟为专题进行讨论,各有所攻,推动了对465窟的研究。

九、图像专题研究

敦煌研究院孙毅华副研究员的《敦煌中唐吐蕃时期石窟研究——中唐第231、361窟吐蕃建筑画研究》公布了她新近发现的敦煌壁画中保留的大量吐蕃时期的建筑信息,并认为在中唐敦煌石窟的开凿中,有熟悉吐蕃建筑的工匠参与其中。这些敦煌建筑画成为今人研究吐蕃建筑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于硕报告的题目是《山西青龙寺取经壁画与榆林窟取经图像关系》。该文比较了山西青龙寺与榆林窟中取经壁画间的异同,重点讨论了从西夏石窟中取经图像至山西青龙寺拱眼取经壁画的流传脉络,并总结了不同时期取经图像的演变规律。

中国佛教协会《宗教文化》主编桑吉扎西的《敦煌吐蕃石窟壁画艺术》阐明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壁画艺术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独特问题。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进玉的《敦煌吐蕃时期壁画“农作图”及其有关问题》则主要就弥勒经变中属于农作图中的个别图像作了辨识,指出当非农作图。瓜州博物馆馆长李宏伟的《瓜州东千佛洞西

夏壁画艺术》简要介绍了东千佛洞壁画并探讨了其艺术风格与特征。兰州大学郑怡楠硕士的《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水月观音图像研究》主要就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水月观音像进行了综合研究。

十、文物文献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扬之水研究员发表了《吐蕃艺术名物丛考》一文。扬先生从名物研究的角度,首先讨论了青海海西州都兰县吐蕃墓三号墓出土的一组彩绘木构件的定名问题,然后以拉萨大昭寺中心佛殿的两幅早期壁画和故宫藏吐蕃时期出自东北印度工匠的几尊金铜佛像为例,从造像中的“丹枕”与“绹纒”两个细节入手,通过对其历史名称的梳理和考订,追索图式来源,进而勾画出图式传播演变的轨迹,即印度——吐蕃——西夏,并兼及传播过程中的若干相关问题。

敦煌研究院文献所张延清博士的《吐蕃敦煌抄经纸张》揭示出在弘佛的吐蕃赞普墀祖德赞之世,敦煌兴起大规模的佛经抄写浪潮,其中抄经纸张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该文研究了吐蕃敦煌抄经纸张的分发、经叶形制、纸张的产地及当时纸张的价格等十分有趣的问题。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王一鸣教授的《四川洪雅县藏唐敦煌本大般涅槃经考》一文介绍了一件私人收藏的敦煌本经卷的流传与版本及其价值。

小结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论文体现了敦煌吐蕃石窟艺术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出“新、

深、细”的特征。

“新”，指新发现、新方法、新角度。新发现，指许多学者或依托扎实的学风，或借助最新的科技手段，在敦煌研究和西藏文物调查中有新发现，如田中公明、张建林、谢继胜、沙武田等先生公布了其最新发现，明显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

新方法：有着深厚佛学义理、密教及藏学背景的学者们运用图像学、佛学、藏学等领域的交叉方法，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如郭祐孟、黄英杰等台湾学者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为敦煌吐蕃艺术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领域。

新角度：跨学科的多角度研究是新趋势。近年来，除了以传统的历史学、图像学为视角的研究仍继续发展外，有更多学者开始站在美术史、宗教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审视敦煌吐蕃石窟的问题，如罗世平、邱忠鸣等先生的研究。

此外，有学者如日本的桥村爱子女士对敦煌石窟中的某个专题——孔雀明王图像进行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深”，则是指对已有领域的纵深推进。如马德、赵晓星等先生对吐蕃时期石窟供养人画像，李翎、彭杰等先生对毗沙门天王像，赖文英先生对榆林第25窟的研究，在发表重要观点的同时，均十分深入。对密教图像、莫高窟第465窟的集中探讨，也必将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

“细”，即是对某些图像与问题进行细微的分析研究。如法国学者今枝由郎先生对T形框、日本学者大西磨希子、下野玲子、滨田瑞美等先生对观经变十六观、莫高窟第159窟法华经变、千手千眼

观音眷属等图像的研究，以及杨之水先生对吐蕃艺术名物的研究等。学者们的研究细致入微、以小见大，揭示出小问题背后深刻的文化意涵。

“推陈出新，培养新人”也是敦煌研究院举办学术会议的一项宗旨。会议期间一批硕博士们各自发表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展示了新一代研究力量的蓬勃生机。另有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大学、兰州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院校的10余名硕博士们列席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安排专家学者们考察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瓜州博物馆等胜迹，激发了大家的研究激情和灵感。7月24日下午，本次研讨会举行闭幕式，罗世平、张建林、谢继胜、陈清香、今枝由郎、田中公明等多位专家发表了对本次会议的感言，从各方面充分肯定和赞扬了敦煌研究院举办这次学术会议的意义和作用。

敦煌吐蕃石窟艺术的资料十分独特，所涉学科门类十分广泛，研究的难度也很大。但从本次会议可见与会专家们利用各自的学术特长，咸有发现，取得了丰硕成果，显示出敦煌吐蕃时期石窟艺术研究的活力与广阔空间。

沙武田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 研究员
博士

第一届执竞奖学金 评选活动成功举办

6月10日下午，第一届执竞奖学金评选活动在服装学院科技报告厅成功举办。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贾荣林、造型艺术系主任王铁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独立策展人王宝菊、评论家顾振清、青年艺术家张小涛等校内外专家学者做为评审团成员出席了本次活动。

“执竞奖学金”是由艺术家喻高资助发起，由北京服装学院造型艺术系主办。2009年5月正式启动，通过为期一年的公开征集作品，由校内外艺术界专家共同对参选作品进行评比筛选，每年在申请人中初选8~10名入围，再复审选拔2名获奖者，并组织召开专家见面会、获奖及入围作品展等活动。“执竞奖学金”旨在奖励对艺术事业有执着追求并富有创造精神的优秀青年学子，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华的平台，并向相关艺术机构推荐、提供毕业后继续从事艺术创作的机会。

通过评审团筛选，最终北京服装学院油画专业应届毕业生陶彬和雕塑专业三年级学生李彪荣获第一届执竞奖学金，并得到评审团的一致好评。